



柏油路上的战争

“7·25”劫机事件始末

南斯拉夫的青年男女

往天山伏击战

瑞航班机上难忘的邂逅

BH47117

J37.2
377
3

柏油路上的战争

计红绪 著

农村读物出版社

1989·6

B443534

柏油路上的战争

计红绪 著

责任编辑 周承刚



农村读物出版社出版

三河县二百户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首都发行所发行



787×1093mm 1/32 10印张 210千字

1989年6月第一版 1989年6月三河县第一次印刷

印数：1—10000册

ISBN 7-5048-0382-0/I.64

定价 3.80元

目 录

在时代狂飙面前(代序一)	杨永安	1
计红绪的“自我否定”(代序二)	刘建伟	5
马鞍上的童年		8
我走文学道路		14
灯火辉煌的巴黎		19
开满鲜花的日內瓦		25
瑞航班机上难忘的邂逅		31
南斯拉夫的青年男女		37
巴基斯坦商人		45
沙加的魅力		52
“7.25”劫机事件始末		57
挂天山伏击战		73
寒江雪		93
合成军指挥官		117
柏油路上的战争		178
京华交通与交通警		302
后记		313

在时代的狂飙面前

访著名中年剧作家计红绪（代序一）

杨永安

长篇小说《柏油路上的战争》，从1987年3月起，曾在《北京日报》上连载，受到读者赞扬，改编为8集电视系列剧播出后，在社会上得到广泛好评。公安部领导高兴地说：“这是继《便衣警察》之后，又一部反映公安战线工作和生活的好作品。”但记者去访问该剧编剧计红绪时，他却没有多谈《柏》剧，而是兴致勃勃地谈起他的新作——正准备开拍的6集电视连续剧《城市脚步》。

《城》剧写的是首都建设者为解决日益严重的道路交通和城市用水等问题，修建立交桥和水源厂的故事。计红绪说：“在首都的历史上，还未曾有过这样的事：50座大型立交桥和日供水50万吨的巨型水源厂同时兴建，它象狂飙一样，震撼着城市。”

作家、艺术家是容易激动的。问题是，在什么事物面前激动？在采访过程中，记者深深感到，计红绪是在火热的四化建设面前激动，在时代的巨大变革面前激动。他说：“我在《柏油路上的战争》中写了：改革开放以来，首都机动车辆

猛增至40万辆，自行车增至680万辆。再不改善道路，城市会出现‘交通危机’。日本由于战后经济迅猛发展，出现过这种危机，人们叫喊‘消灭汽车’。后来成立以总理大臣为首的‘交通对策委员会’，皇太子也参加，拨出巨款改善道路，才度过了危机；美国也出现过类似情况。北京不下狠心修立交桥怎么办？真到了危机时就晚了！”他又说：“首都缺水问题同样特别严重，8个水厂全采地下水，已超采25亿吨，仍以每年超采3亿吨的速度发展着，首都面临水源危机。夏季用水高峰时每天亏水25万吨，许多地方自来水上了不了三层楼，肉联厂失火，消防用水的水压也上不去。不兴建使用水库蓄水的水源九厂怎么办？真到全城断水时也就晚了！”他说，市政府在财政十分紧张的情况下，下狠心搞市政建设，是正确的，是为了全市1000万人民的根本利益。计红绪说到这里，禁不住站了起来，他又一次动了感情。“夫缀文者情动而辞发。”有了要表现这一题材的创作冲动，他立即投入采访和写作，他表示，要在《城市的脚步》中热情歌颂市政工人，表现人民政府为人民这一主题。

这类正面写四化建设的作品，包括《柏》剧在内，都是不太好写的。但是，计红绪写了。前几年，他还写了难写的《决策》，那是正面反映震惊中外的“引滦入津”工程。他成功了。该片被报刊评为“感人至深”的影片。他还写了反映工业改革的影片《春兰秋菊》和反映周总理亲自领导民航开辟国际航线的影片《208客机》。这些影片都获好评。但有谁知道，在它们的背后，作家付出了多少心血！

为什么计红绪总愿“啃硬骨头”？他不善于写侦破、武打、多角恋爱吗？不。他编起故事来特别离奇。他曾写了影

片《潜影》，改编为长篇小说《王府怪影》后曾风靡全国，各报刊争相转载，又被改编为京剧、评剧、话剧、歌剧演出。他也善于写历史剧。他读大学时便发表了历史剧《辛弃疾》；后又发表《郑成功》；《东周列国》早已拍成电视连续剧同观众见面；他的22集电视连续剧《雍正皇帝》不久将播出。然而，他逐渐把创作重点放在反映四化建设上。他为此激动，为此花费大量心血，不惜打“攻坚战”。他说：“我看到了党内一些腐败的现象，但也看到了很多更为激动人心的现象——许多党的干部从心眼里热爱群众，不惜牺牲自己的切身利益，拼命工作，做出很大贡献。百花齐放，别人写什么是人家的自由，我想写四化建设题材。没有四化建设，国家强盛不了，什么都是空的。”这时，他拿起一张报纸，读到赵紫阳同志最近的谈话：“今后五年，将是中国从旧的经济体制转为新的经济体制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历史时期”，“我们现在最为关注的问题是能不能确保改革成功。”计红绪说：党现在面临严峻考验，进入建党以来又一个非常时期。此时此刻，文艺工作者不能无动于衷，更不能专门汇集阴暗面，挖党的墙角。而是应该满腔热情地歌颂伟大的四化建设。作为作家，计红绪一心想着党和人民的事业，以艺术形式为党做宣传工作，这是难能可贵的。

计红绪原计划写《京城三部曲》。《柏》剧为第一部，《城》剧为第二部，他还要写第三部——反映煤气工人生活斗争的电视连续剧《驯火者》。现在，在时代急促的脚步声中，这“三部曲”的计划又被打破了，他又在计划写一部多集的电视系列剧《中国刑警》，以首都发生的凶杀、抢劫、爆炸、强奸等形形色色的刑事案件为主要情节线歌颂首都刑警的丰功

伟绩，表现他们的喜、怒、哀、乐。以上几部电视剧计红绪不仅是编剧，还是独立制片人和总监制。题材难写，责任重大。计红绪熟悉人民群众火热的斗争生活。写《春兰秋菊》，他与纺织工人交朋友；写《决策》，他多次深入引滦入津工地，有一次竟摔倒到河里；《柏油路上的战争》，他又与交通民警为伍；目前写《城市的脚步》，他一直有病，却多次在大雨中深入立交桥工地。他热爱四化的建设者们，与他们心心相通，有着饱满的激情。“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我们相信，计红绪一定可以写好这“三部曲”，或“四部曲”，“五部曲”，因为他是对四化建设题材有浓烈兴趣的作家，因为在时代的狂飙面前，他是真诚拥护这一巨大变革的共产党员。

（原载1988年8月27日《北京日报》）

计红绪的“自我否定”(代序二)

刘建伟

“没想到，当个交通民警这么不容易！”

看了近日播出的电视系列剧《柏油路上的战争》，许多观众情不自禁地发出感叹。公安部的领导高兴地说：“这是继《便衣警察》后，又一部反映公安战线工作和生活的好作品。”公安部交通管理局负责同志说：“男儿有泪不轻弹，我看这部电视剧几次流泪。”广大交通民警更是为之振奋，不少人触景生情，边看边流泪。北京市丰台交通大队长说：“看到交通民警雨夜加勤顾不了家，我一阵心酸，都不敢看那位民警的妻子。”

当记者采访这个剧的编剧计红绪时，他却说：“是导演和演员们各具特色的艺术处理，使这个剧表现了动人的感染力。我写的剧本并不理想，还有很多疏漏。如有些情节是写在纸上，而一到屏幕上表现，戏就立不起来了，发现了剧本不少结构问题。”

计红绪是一位高产作家，近10年来，他创作的影视剧本多达50余部(集)，并撰写出版了《雍正皇帝》、《怪胎政府》、《柏油路上的战争》、《九马疑踪》、《计红绪电影剧作选》、《异国见

闻录》等7部长篇小说、剧作选和散文集等著作。1982年公映的《春兰秋菊》，是较早描写工厂改革的影片，曾受到电影局的称赞。《决策》则被评为“感人至深”的影片。

《208客机》公映后，又多次被中央电视台播放，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剧本《招讨大将军》、《怪胎政府》等均得到文艺界老前辈的赞许。影片《潜影》又改编为小说《王府怪影》曾被数家报刊连载，并有10多个省市改编为话剧、歌剧和评剧演出。同时，他写的电视连续剧《九马疑踪》、《东周列国》等也陆续和观众见面。对于自己艺苑里的收获，他从来没有满足，反而经常反省和否定自己公诸于世的作品。

1980年，他曾对自己的创作道路作了一次重要的否定。他在一篇题为《责任·生活·探索》（载《八一电影》杂志）的文章中写道：“1976年，上影厂把我的剧本《千秋业》拍成影片，曾被批判，1978年组织上作了纠正。由于自己错误地接受了这个教训，我想还是离现实斗争远一点好。”于是，他转而写了科学幻想题材的《王府怪影》。然而，不久他又反省道：“我缺乏社会责任心，没有深入火热的现实生活，没有去表现当代人的风貌，走了弯路。”从此，他坚持在现实生活的土地上耕耘。那描写工业改革的《春兰秋菊》，反映周总理亲自率机开辟国际航线的《208客机》和表现引滦入津工程的《决策》，就是这个时期孕育的产儿，也是他敢于否定自己的结果。

能够自我否定，需要有艺术家的勇气和魄力，计红绪在此表现的气度，比之他在艺术上的才华显得更加可贵。

最近，他写的反映北京15座立交桥建设的电视连续

剧《城市脚步》和反映煤气工人斗争生活的电视连续剧《驯火者》即将投入拍摄，它是继《柏》剧之后，作为“城市三部曲”的第二部和第三部。他的60集电视系列剧《中国刑警》也正在赶写和筹拍。我们深信，经过不断“自我否定”，必然会不断提高，计红绪将不断有好作品问世。

（载1988年8月22日《北京晚报》）

马鞍上的童年

每忆儿时，总有海潮般的情感，奔腾咆哮着向我扑来。那一段时光，对我后来走文学道路，甚至整个一生，都有特殊的意义。早想写一篇儿时纪事了。然而，接到北京大学《中外名人的少儿时代》征稿信，却如汹涌波涛拥塞在狭谷，万千感慨拥塞在笔端，鼓荡在胸际，是以伏案许久，未能渲泄。事隔30多年了，从何写起？

终于，隐隐地，我听到从遥远的地方传来的马蹄声；看到战火、硝烟，火红的旗……

那是什么样的年代啊！

东出古北口

1940年，我出生在河北省遵化县。祖父戴孟九是国各庄村小学教员，与祖母精打细算过日子，供父亲戴秉公上大学。父亲在天津的河北工学院毕业后参加了革命，配合游击队杀死了残害革命同志的日本翻译官，当了八路军。他在冀东担任临(榆)、抚(宁)、昌(黎)联合县长，并把母亲带出

参加革命。为使家庭不受牵连，父亲改名计明达，从此我一家都姓计了。

父亲虽然是知识分子，却非常勇敢。他经常背着一个“钱搭子”，一面装县政府大印，一面装手枪，四处进行革命斗争。斗争最残酷的时候，他竟然钻入敌人“据点”里，住进可靠的老乡家，白天进地洞，夜里活动。我与母亲随冀东东部办事处活动，只要一有空，他就来看望我们母子，但更多的时间不能同我们在一起。所以如遇到危险，便由同志们来救护。有一次战斗，日本鬼子在后面追击，母亲抱着我跑，累倒在山坡上，敌人眼看就追上来了，极为危险。跑在前面的一位办事处负责同志忽然叫道：“文玉（母亲的名字）她们娘儿俩呢？快去找！”他忙带两个战士跑回来，将我们救走。

1945年9月，日本投降后，冀热辽军区李运昌司令员率部进入东北，我父亲随他出关，担任第一任锦州市市长。一个多月后，组织上安排我随母亲出古北口去找他。

我们乘一辆马车，由一位同志护送，穿过崇山峻岭，进入热河境内。山高，路远，土匪成群结队。多亏编入东北民主联军序列的50多名新四军战士同行，一路照顾，才到了平泉。当时驻在此地的25旅旅长杨思路热情接待了我们，张兆仁同志派人护送我们到了北票。

父亲在锦州只工作两个多月，便撤退到北票了。我们在那里与他相会。当时形势极紧张，国民党反动派不停地进攻，爸爸昼夜开会。但他一有空就抱着我，同妈妈说笑。他叫警卫班长张海山叔叔带我去做一套小军衣，“马裤”，即大腿两侧宽出一大块而下面很紧又带扣子的军官裤，让我也成为骑马的军人。

风 雪 辽 西 路

我们又向北撤退了。我与母亲随热辽地委机关先走，爸爸带部队在后面执行战斗任务。

正值隆冬，大雪横飞，辽西山区异常寒冷。我与警卫员刘广胜叔叔骑在马上，冻得两脚发麻，便到装满大棉花包的马车上暖暖脚，然后又上马。我特别喜欢骑马。一九四六年初，热辽军分区、专署，将敖汉旗和奈曼旗的几个区，成立新东县政府后，我常常骑张海山叔叔的小青龙马。这是一匹“走马”，跑起来只是快步“走”，很平稳。有时是与警卫员景泉和刘广胜叔叔同骑，有时我独自骑，身上背一支小手枪和一把铜号，自认为很神气。我还经常骑毛驴。

国民党军在后面追，反动的蒙古武装（我们称之为“蒙古队”）也不时来骚扰。这些反动分子都是骑兵，往来飘忽，十分凶猛。

一天，我们队伍前面传来枪声，几百名骑兵拦住去路。妈妈把我从马上抱下来，在路边土沟里卧倒，大家开始开枪还击。我有一支从国民党手中缴获的小手枪，比花牌撸子还小一半，名为“张手雷”，虽不会放，也壮壮胆。双方打得很激烈，机枪也开火了。不知为什么，我对打仗一点也不害怕，比过去有进步，大概是我们军队壮大了的缘故吧。

打了十几分钟，对方摆动联络旗。奇怪，好象是自己人。我们这边也摆联络旗。双方停止射击。原来是打误会了！对方竟是我父亲和北票下来的部队。他们是骑兵，跑到我们前面去，还以为我们是敌人呢。

在狂暴的风雪中，我们又冷又饿，向西北内蒙敖汉旗的方向前进。走过的许多地方满目疮痍，到处是战火，是饥饿，是哭声。尸体时有所见。小村子里，常见赤体儿童，裹着破棉袄，披着麻袋片，靠在墙头瞪眼望着我们队伍。十八、九岁的姑娘没有衣裤，裹着破开花的棉被缩在土炕上。每见村头瑟瑟发抖的孩子，爸爸妈妈总要勒住马，有时下来问他们话，叫人拿被服食物送给他们。爸爸还给一些孩子拍了照片，作为战乱的见证，这些照片至今还被父母保存着。

群众对我们热烈欢迎，把自己保存得最好的东西给我们吃。什么是最好的食物呢？原来是芝麻粒大小的圆粒，我吃起来香喷喷的，这是鸦片烟种子。这一带尽种鸦片。

热 闹 的 热 河

辽西和内蒙及河北的一部分，当时称热河。1946年春到1948年，我们走遍了赤峰、平泉、叶柏寿、朝阳等地。正值中央召开彻底解决土地问题的会议，下达“五·四指示”，我们的队伍发动群众分土地、挖浮财、扩军、支前，热河省一下子热闹起来！

我最感兴趣的是分浮财。我每天拿一条棍子跟妈妈或别的叔叔去地主家，跟大伙一起在地下乱捣，只要听见有空洞声，便用铁锹挖，一定可挖出金银财宝或贵重衣物。挖出来的东西多极了。分给贫苦百姓时，千百人敲锣打鼓，非常热闹。人们再也不披麻袋片、吃鸦片烟子了！

那些日子，我特别兴奋。从出生时起，我一直在紧张、惶恐中东奔西跑，这一下可“翻身解放”了！我看见了老百

姓吃第一顿“胜利饭”，穿第一件“胜利衣”的喜悦，看见了青年参军的热烈场面，也看见了斗争地主恶霸的激昂情景。我仿佛突然长大了很多。我对枪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学会玩各种枪。当时，爸爸、妈妈都带枪，爸爸的警卫班六、七个人，每人都有两只枪，我也有一把“张手雷”，是美制小手枪。我会熟练地拆装冲锋枪、步枪、驳壳枪，和枪牌、马牌、蛇牌、花牌、狗牌撸子枪。为学用枪，也出过两次危险，一是走了火，子弹从窗台反跳回来，打在警卫员于德叔叔（正在睡觉）的大衣上，穿了个洞；二是把我自己左手打伤，两个多月才好。为这二事，受到父母严厉批评。但我对枪的兴趣有增无减。我立志日后参军，当一名持枪保卫祖国的战士。我那时还用玉米粒当作兵，行军、布阵、进攻，象指挥员一样运用战略战术，持续多年，到上高中时仍如此玩。如今，我成了一名解放军军官，终于实现这个理想，所以回忆起来很甜蜜。

我也看了不少戏剧，如《牛永宝负伤》、《兄妹开荒》、《王秀鸾》、《上当》等，至今还清楚的印象。我非常喜欢看戏，记得住主要人物和主要情节，甚至记得住里面的歌。有个歌剧叫《兵》，多少年来我都在唱它的插曲——“兵呀兵，是哪来的兵？当兵的都是老百姓。只因为老蒋要杀人民，中国才有了两种兵。”前年，我还同《赤叶河》的作者傅铎同志谈这些往事，我哼起“赤叶河边洗衣裳，猛抬头，天上看，看见通鹅过南山。通鹅通鹅等等我，我把苦事说一说……”这位老戏剧家兴奋地接下去：“燕燕儿今年二十整，二十光景尽苦情……”我走文学道路，从事电影创作，是在中学和大学确立志向的，但儿时对戏剧产生强烈兴趣，也是

一个重要因素。

更重要的因素是那个火红的时代。1947年到1948年末，我被送进了部队机关的保育院，也是动荡不安。解放战争在激烈进行，我们随部队到处转移，随时都有危险。在这种时刻，我，还有小朋友赵战战、万蓓蓓、邵东生、邵东英、赵韵梅等（不知如今他们在何处？）虽然都很小，最大的也只有十一岁，却变得“勇敢”，一遇敌情，大家不哭不闹，服从阿姨指挥，迅速收拾东西转移，俨然是一群小战士。我们还象部队一样，常把好吃的东西分给贫穷的农村小朋友。

入中学之后，在可以阅读的作品中，我最喜欢的就是描写抗日战争、土地改革、解放战争的小说和革命回忆录。每一开卷，便似身在其中。这个时代在我身上打下的烙印太深了。得天独厚，我在那样的时代里度过了童年。

童年距今很遥远了。也许是年龄越大，回忆起来越甜蜜。提起笔来，眼前便有战火，耳边便有得得的马蹄声。儿时种种色彩斑斓的经历，如万斛泉水，不择地而出……